

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

托氏百年话“出走”

□闫吉青

100年前,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于耄耋之年,步履蹒跚地匆匆离开了生养他的故土亚斯纳亚·波利纳庄园,从此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悬念,托氏出走之谜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适逢托翁辞世百年纪念,我们日话重拾,寄托对于伟大作家不尽的哀思;亦欲借此机会,启发后人。

关于托氏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家庭不和”说。英国著名托尔斯泰研究专家阿尔默·莫德指出,“促使他出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无法与妻子和睦相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国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援引奥地利文学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观点,认为托氏临终前的出走意味着“逃向青天”,逃向宁静与高远,投奔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从1882年开始,托氏从安宁舒适的家庭生活转向对于自我完善、精神进步、生命意义的探索,这时,旨在维护安定、惧怕变革的家庭便不幸成为精神行进的累赘。关于这一点,托尔斯泰的弟子布宁阐述得更加清晰,他指出托氏之所以出走,正是要超越无常的现世,去探寻永恒的生命。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出走是其一一生精神探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其所处时代精神状况的最好注脚,家庭矛盾只是引发其出走的一个契机。

托尔斯泰2岁丧母,9岁丧父,兄长们也都先他而去,有6个孩子在他之前辞别人世,亲人的相继亡故给作家带来无尽的痛楚,这种痛苦意识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内驱力,同时也铸就了其伟大人格的基础,对其创作的独特个性与价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人生的奥秘、探索生命的真谛,屡次在作品中描写“死亡”的场景以及主人公关于生死的紧张思考。《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对于永恒生命的体悟及其死亡体验,《三死》中贵妇人、农民与树木三者之死的对比,《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于安娜之死的细腻心理描写等等,无不体现出作家深刻的生命体验及其独特的生命意识。托尔斯泰认为,人的肉体生命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并且肉体生命使人追逐物欲,从而犯下种种罪

过;而精神生命则通过道德自我完善和精神的提升,使人摆脱烦恼的羁绊,穿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永恒;财富、荣誉、爱情等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与永恒生命无关。不但无益于生命的提升,反而会成为精神解脱的障碍。

托尔斯泰深受老庄思想、孔子思想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体悟到个体的“我”与宇宙生命同为一体。他在1910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帝是无限的一切,人只是上帝的有限的相”,“人(生命)作为上帝的一种相与其他活物诸相(诸种生命)融合得越多,上帝的存在也越多。使自己的生命与其他活物诸种生命的融合得以完成的是爱”。自我幸福与宇宙息息相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行善,在于爱人与宽恕;一个人若要拓展自己的心境,具备比较广阔而深刻的人生观;欲避免生活的枯燥无味就必须增进与他人的融合与团结;只有改变人类自身的精神状况,使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才能实现人类永恒的幸福。

托尔斯泰在其论著中对时代许多重大问题都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激烈地抗议强暴者、统治者和富有者对于劳苦大众的压迫与剥削,抗议战争、迫害、赋税和监狱等形形色色的暴行,对政府、兵役、金钱、财富、两性关系、农民处境、土地、宗教、体力劳动、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把深刻的宗教精神同大无畏的勇气和真诚结合在一起,其理智与良心的呼声振聋发聩,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托尔斯泰的人生与艺术实践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产生了罗曼·罗兰所誉的世界文学史上“作品与生命从没有比托尔斯泰联络得更密切的了”的文学奇观。19世纪80年代,他开始实行素食、戒烟戒酒、放弃打猎,从事体力劳动。托尔斯泰善于领略生命的乐趣,热爱大自然,喜欢散步、骑马,爱好音乐、下棋,同时又擅长刘草、建房等,兴趣十分广泛。这一切足以表明,托尔斯泰是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人。他珍视生命,希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追求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中去,他尽力履行基督的训诫,时时忏悔并寻求帮助;认为财产是罪恶和痛苦的根源。只有彻底摆脱尘世一切欲望,才能超越无常的“小我”,找回那个更带根源性质的“永恒的大我”,实现个体与永恒宇宙的融合与统一,发现生命的真谛及其永

恒价值,体悟无上的“大道”真理。托尔斯泰以实际行动为其一生的精神探索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托尔斯泰清晰地认识到生命的解脱之路在于弃绝物欲、追求精神的提升。他热切地欲将人生的真相告诉世人,希望用道义上的劝告迫使世人弃绝罪恶,走向解脱。遗憾的是,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精神内涵的人少之又少,世人大多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对于他的呼吁漠然视之,甚至认为是痴人痴语,惊世骇俗。他拯救世界的热忱导致他和许多朋友疏远,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幸,托尔斯泰与妻子之间的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信念与世俗生活既定秩序之间种种分歧而不可避免

地产生的齟齬。的确,对于托尔斯泰,人们只能是望其项背,而缺乏他那种勇往直前,破釜沉舟的勇气。托尔斯泰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点,变得愈益包容、平和。

尽管大多数人不能完全理解甚或不愿践行他的某些思想,但却折服于他那真诚透明、无私无畏的精神特质和特殊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理想的火花,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精神感召力。19世纪80年代之后,托尔斯泰声名鹊起,成为全俄乃至举世瞩目的对象,他的学说备受世人关注,他的著作也愈益畅销,许多文学团体、大学和学院授予他各种荣誉称号以示敬仰。然而,在这种时候,“他的微笑是悲哀的,他的眼睛因为泪水而潮湿”,他孤独地踽踽前行寻觅心中惟一的珍宝。他在1879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五种类型的人,他写道:“有些世俗的人,迟钝又没有翅膀。他们的境界在地上……有些人他们的翅膀生得很平稳,他们慢慢地升起、飞行;僧侣。有些机警的人,有翅膀,他们轻而易举地从人群中升起,然后又掉下来了;好的理想家。有些有着坚强的翅膀的人,他们由于肉体的渴求,掉在人群中,折坏了他们的翅膀,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带着破碎的翅膀挣扎,用力地鼓翼,然后倒下。假如我的翅膀痊愈了,我要飞得很高。但愿如此……有些人他们有着天神的翅膀,而故意地——出于对人们的爱——降落到上来(折拢他们的翅膀)教人们飞。当他们不再被人需要的时候,他们就飞走:基督。”事实上托尔斯泰就是那种有着天神的翅膀,而故意降落到上来教人们飞的人,当发现人们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要悄悄地飞走。

弄到一个灵感?”然后,一种恐慌就来了,最后,想法总算出现了。要是我知道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把这个过程复述出来,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灵感就是那么悄然而至。

布:《羞辱》中的主人公——舞台剧演员西蒙·埃克斯勒——从一开始就摊上了自我毁灭性的爱情,他爱上了那个既危险又有点损人利己的女孩。那女孩是个饶有兴味的人物,我想请您谈谈这个人物,谈谈这个损人利己的女同性恋者的原型。

罗:到目前为止,读过这本书的人还为数不多,此前还没有人用类似的词语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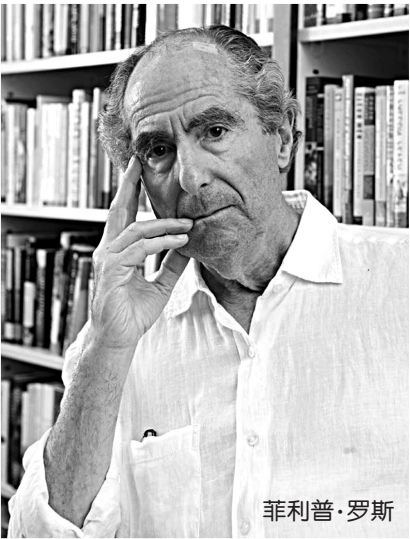
过她。我的本意并非要把她塑造成损人利己的人,而是要表现情境的不可靠性,即:西蒙遇到了不可靠的情境。我并不觉得她比別人更损人利己,她只是处处为自己着想而已。她有迷人之处——性感、妖媚。她使他幸福、快乐。在说她损人利己之前,我们一定要记住: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极其快乐、极其幸福——而这个男人,在小说开始时曾是那么痛苦不堪。是她结束了他的痛苦,然后,她弃他而去,把他又抛回痛苦中。不过,我倒是会记住你对她的评价——损人利己。

布: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我想知道的是,您对自己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您已走过了手脚不及从前那么麻利的60岁,那么,人过七旬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罗:啊,状态不错,很棒!再好不过了!现在,我倒是非常希望80岁早点到来,当然,对我来说,80岁还不会来得那么快。很奇怪,你只会把数字跟房子联系起来,76,我是76,那是一个门牌号,不是我的年龄。适应老年已至的事实不是一件易事,当然,最难的还是适应死亡的逼近。只要身子骨硬朗,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里得明白,你的时日已所剩不多,而到底剩多少,你又不清楚,也许很短!这就有点像警讯的感觉。

布:作为一名作家,您是否在想:我应该再写N本书,我要写的就只有了这些了吗?还是您一直跟着自己的创作感觉走,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

罗:我不关心的是是否能够再写N本书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自己是否一直在写作,所以我想让自己一直处于写作的状态。我几乎没有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头脑里想着下一本书,如果有,也是极少。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始于灰烬中,因此,我并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一定要写出来,也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一定要讲出来。我只是想着:生命不止,创作不息!



菲利普·罗斯

罗:对,这个叫法很贴切!“倾泄稿”!初稿就是这么倾泻而出的,接下来的几稿基本上也都是“倾泄稿”。不过,最终的定稿确实

要花费很多时间。我极想知道在故事发展中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所以我需要先把故事写完。

布:在写作时,您通常是以主题思想开头,还是以一个人物或情境开头?

罗:我就以《羞辱》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这本书是从一行文字开始的,也就是本书第一行:“他丧失了他们的魔力”。当时,我脑子里闪出了一个演员——不是某一特定演员,而是泛指任何演员——不会演戏了。这个想法勾起了我的创作欲望。

布:这是个您认识的人,还是您读到过这样的故事?

罗: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人,真的,我也不认识这样的人。但我就是喜欢上了这个想法:一个人走上舞台,然后突然间所有的一切弃你而去,所有的才能丧失殆尽。我觉得这个情境值得挖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第一行:“他丧失了他的魔力”。接下来,我就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去探寻可能会发生的故事。

布:对于江郎才尽的焦虑不仅折磨着演员,也同样折磨着作家吧。我的意思是:您自己是否曾遇到过类似的情景,您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本来心里想表达的是“坐下”,但写出来的却是“站起”——站在演讲台前,也丧失了魔力。您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罗:是的,有过。每次写完一本书,还没开始下一本的时候,这种情况便会如期而至。我想,我拼命地描写,出书就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无书可写的状态。然而,通常的情况是:每当写完一本书,我就会问自己:“接下来我该干点什么?我从哪儿才能

生命不止 创作不息

——菲利普·罗斯访谈录

□戴兴伟 孟宪华 译

菲利普·罗斯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犹太裔作家,他一向以多产而又始终保持高质量的创作著称。2009年11月,他的第30部作品——《羞辱》由休顿·米弗林·哈考特书局隆重推出。《羞辱》讲述的是暮年舞台剧演员西蒙·埃克斯勒在演艺和情感上的失败及最后自杀的故事,涉及了比较敏感的同性恋题材,书中不乏对性行为和酷儿行为大胆而露骨描写。小说出版前夕,罗斯应《每日野兽》总编辑首席执行官、传奇女编辑蒂娜·布朗之邀,做客该杂志,与布朗进行了对话。译文见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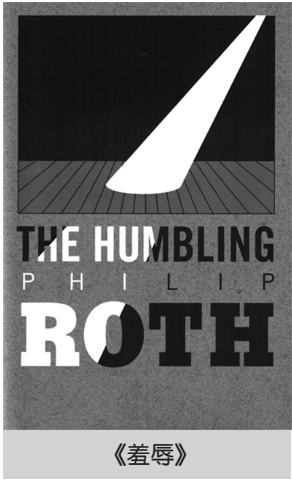
蒂娜·布朗(以下简称“布”):过去12年,我们见证了您那让人难以置信的创作激情——如《美国牧歌》《反美阴谋》(人性的污秽)等等。目前,您又完成了第30部小说《羞辱》。请问,您近年来创作激情高涨的原因何在?

菲利普·罗斯(以下简称“罗”):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我跟过去一样,还是那么卖力气地写。我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定期出书,反正,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写作上。如果你也像我这么干的话,那么你至少也会一天写一页,一年下来,就是365页。所以说,日积月累,我的那些书就出版了。

布:您的近作似乎比以往更率真、更浑然天成,我认为,您目前正处于创作的最高峰。读您的近作,让人有一种紧迫感,尤其是那些篇幅较短的小说,差不多能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我感觉,您好像是被某种情感攫住了,然后一气呵成,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对于篇幅较短的小说,您一般要花多少精力去修改呢?

罗:对于篇幅较短的小说,我修改的次数一点也不比其他小说少,投入的精力同样很大!我不会不断地修改,一本书才会现出勃勃生机!第一稿往往都很粗糙,但至少是已经大致完成。只要有初稿,我心里就有了底,也就有了往下进行的保障。那么,接下来的活儿就是修改了。以前我用打字机,现在用电脑,比较起来,修改已经不是什么事难事儿。所以说,我的书全是经过无数次修改而成的。

布:这么说,您不是那种把一个段落修改到满意才继续的写法?我曾把您这种一泄而出的稿子称为“倾泄稿”,一次性把全部内容付诸纸上,然后再回过头来修改。



《羞辱》

■ 动 态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于10月8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为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顾问吴元迈、朱立元、张中载、郭宏安颁发了聘书。

陈众议在致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论病了。”他还举例说明西方当代文论的诸多“病症”,分析了产生该情况的文化历史原因。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则主张向老一辈外国文论研究专家学习,打通中外文学院系设置的隔阂。社科院外文文学研究所设置的隔阂。社科院外文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元迈作了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学派”的发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产生以来在中国、前苏联及欧洲其他各国的整体发展情况,并以比较的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间的异同,提请研究者注意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文论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成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院长王柯平认为,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提出了未来美学的新生条件与发展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后现代的洞见。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吴岳添在题为“文学性哲学——文学与哲学的融合”的发言中认为,马舍雷关于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观点新颖、振聋发聩,充分显示出马舍雷对从古至今的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的深刻理解。《外国文学》副主编马海良认为,随着中国学术日益贴近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伊格尔顿的理论因其独特品质必将对中国学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汪洪章有感于目前理论膨胀所引发的严重异化现象,认为应对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渊源和理据从根本上进一步加以比较考察,坚持本民族的文化、审美价值诉求和评判标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周启超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有待深化,应重点检阅那些已经在文学观念的演变与文学疆域的

拓展进程中,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中,已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外国文论大家的“文学文本观”和“文学作品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高建平在“文论的现代功能及其反思”的发言中认为,文学创作具有对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的功能,文学理论的言说同样应该具有这样的功能。他主张既要走进理论,也要学会走出理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聂军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美学思想所涉及

的西方文学艺术史及理论批评史有关内容,特别是所谓“浪漫的反讽”,阐述了施氏文艺思想所可能具有的现代乃至后现代性。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史忠义尝试用两点论或者多角度的视野来看待西方文明史上的所谓“五大奇迹”,分析它们对后世现代性思维和行为的影响,并把它们与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比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扬分析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文化工业”的理论在学界所引起的不同反响,并以《唐山大地震》为例,认为目前判定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是明日黄花,为时尚早。

在讨论中,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吴建广谈到,鉴于中国主流文化有严重的西方色彩,建议用中国的人道理念取代西方的以人为本主义;他还认为在德意志精神传统中,对“人本主义”的批判源远流长;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聚斯金德的《香水》都是显例。这引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董小英的质疑,后者认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就是真正树立起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科学精神,中国人的科学意识还需加强,才能辨明是非,以寻求真理,获得创新成果。在“读本与选本圆桌座谈”中,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编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家读本》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就“读本”与“选本”的定位、结构、体例、编选与翻译团队的学术眼光与基本素质等细节提出了建议。(汪洪章 周启超)



《安娜·卡列尼娜》作品插图

主义思想的观照下,拿破仑形象黯然失色。在身受重伤的安德烈眼中,他所崇拜的英雄拿破仑,与在他头上飘浮着云彩的高邈苍穹相比,简直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安德烈假托在拿破仑身上的世俗的价值,在生与死面前都坍塌下去。

时间是永恒的,正如历史的发展并非某一个体力量所能够左右的一样,即使像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人物,在历史的潮流面前也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他的狂妄自大在时间老人与俄罗斯广袤大地及“冬将军”的威力下显得愚蠢可笑。时间称为拿破仑失败的“加速度”,库图

佐夫这位列夫·托尔斯泰最尊敬的俄国卓越军事指挥家正是凭借时间的伟力促进了拿破仑军队的灭亡。《战争与和平》由此成为一部哲学求问录,而不只是一部小说。在悠久的宇宙和历史的长河中,在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生死问题上,在民众的意愿面前,时间创造着出人意料

的伟业,显示着它强大到无法抗拒的威力。在小说的结尾,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作为一个不朽的人仍然活在主人公的记忆里。安德烈的小儿子也正是促使人们对死去亲人回想的因子。或者说,他经常为人们打开过去之门,也正是他向人们召唤着未来,使人们意识到那些即将到来的事物。现实的时间是过去走向未来的必经之途,现实的时间是过去时间的表象,也是未来时间的表象,因为时间是永恒的,历史是永恒的。现实沟通着过去与未来,现实的时间成为过去与未来的对话。

“时间掩盖了死亡。只要你生活在时间之中,你就无法想象它的终止……要知道,你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你不是在屋子里,而是坐在一节把你我带向死亡的列车上,要记住,你的肉体只能生活一个过程,或者生活到一个终点,而只有灵魂在你身上是永生的。”时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死亡》里显然又具有了其内在的逻辑,过去和未来在冥冥中是统一的,并未有任何本质的改变。所有的过去都将汇入未来之中。人世间与生死两茫茫,然而死者以永恒记忆的形式进入到生者的生命之中。在这里,我们从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宿命论中看到了时间的进步和历史的光明。

在哲学意义上,《战争与和平》给予读者的,不是个体与普遍的人类共同悲剧的体验,是关于历史、生命、命运带给人的不朽和永恒。